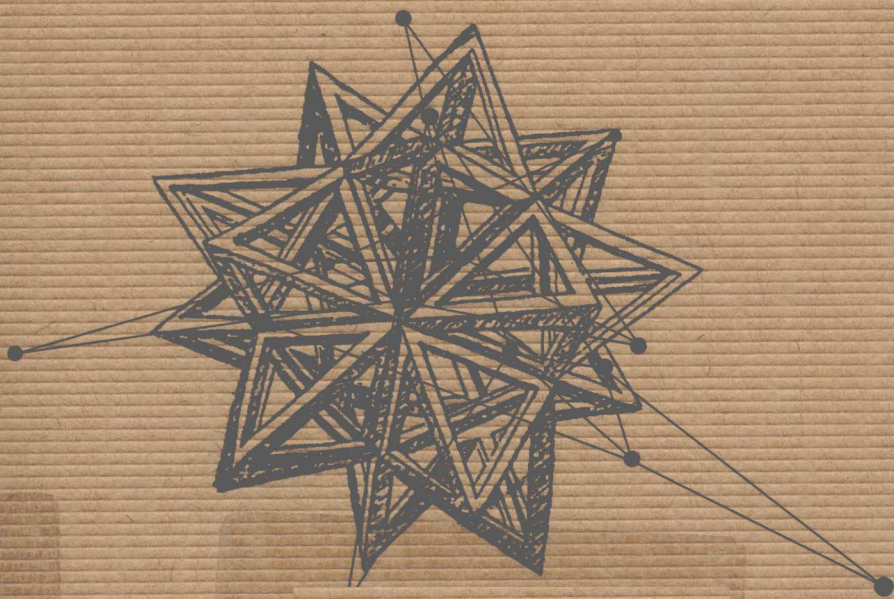


民国学术丛刊·译著编

主编 叶隽 副主编 刘训练



【美】威廉·邓宁著 谢义伟译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 政治学说史·上卷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美】威廉·邓宁 著 谢义伟 译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政治学说史 上卷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民国学术丛刊 总序

就中国传统之发展而言,清民之际乃是最重要的转型时代。这里的“民”不仅指狭义上的中华民国(北洋时代与南京时代又不同),也还包括了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帝制崩溃乃是一大转折,由此所开辟者非仅一朝一代之“更名换姓”,更具备我文明中国之步入现代世界的标志性意义。

虽然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进程极其有限,但自清帝逊位、民国肇创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毛泽东曾有意援用中华民国之名号,充分体现出其作为历史过程自觉者的伟人意识,可终究抵不过劝进者“开天辟地”的创新而最后重新更定国号。不过“民”之一字却始终未易,也可见出“清民易代”的长效性。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意识的逐渐恢复,大陆学界对民国一代学术也给予了高度认同,除了编撰学案、结集成史之外,重印昔贤经典、接续学术传统,则为不可不做的重要举措。除了早期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以影印本大批量推出各类代表性的民国著作之外,还有诸如“民国学术经典丛书”(东方、中

国社会科学等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团结出版社)、“六点学术·民国系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以民国时代为主要内容的,诸如“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旧籍新刊丛书”(岳麓书社)、“蓬莱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各类出版社的“书库”系列也多以民国名著为主,如“商务印书馆文库”、“三联精选”、“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等;而清点20世纪或中国现代学术也多半以民国主打,如“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至于以“国学”为题的,亦然,如“国学入门丛书”(中华书局)、“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还有所谓“近人学术述林”(浙江人民出版社)、“大家小书”(北京出版社)等可谓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在这种背景下还要推出一套“民国学术丛刊”的意义究竟何在?

总体来说,随着20世纪初之废科举、兴学堂的“霹雳手段”,到了1910年代民国肇创后的办教育、立学术,基本已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未掀起绝大波澜。所谓“民国学术”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创立、发展时代的学术状况。虽然这段时间前后不到40年(1912—1949年),但其所产生的丰硕学术成果却不容小觑。就此而言,重刊旧籍,其意决非仅是“旧物利用”;它更指向“重温历史”,意味着我们如何重新认知“昨日”、资鉴“历史”、确立“坐标”、走向“明天”。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充分利用“学术祖辈”的丰厚遗产,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在历史行进过程中不断与“传统”进行对话的自觉意识,这个传统不仅包括中国文明的悠久典籍与先贤智慧,也理应关注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确立典范的“中国现代学统”。而在学术史意识之初的“回归学统”之外,也要有能力在宏观审视世界现代学术发展的背景中从容反省、

我们的学术前辈在传统崩裂、现代初萌、一切仿佛开天辟地的时代里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又留下了怎样的缺憾和距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那代人既要为中国现代学术初期之成就定尺度，也要为中国在世界现代学术谱系中争位置，可谓“重任在肩”。就此而言，出版这套“民国学术丛刊”也还有编选者、导读者、出版者自身的学术寄托。

相比较时贤的“文字飞扬”，这些尘封在故纸堆中的民国旧书自也有其“晦涩艰深”的一面。这不仅是说文字的易代不同、学科的自然演进、关怀的时代语境等等，也还有“今人”与“前辈”的价值取向、文章风格乃至世道人心之间难以避免的缝隙和差距，故此，我们也希望能借助大家的导读，以高深学问而作浅近文字，借助生花妙笔的华彩章句，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我看来，或则可把至今仍在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历程，分为三段六代人。就时段来看，可以分为三段：1912—1952年；1952—1992年；1992—2030年前后。本丛书涉猎范围，基本上是第一阶段和前三代人。第一阶段可谓“黄金时代”，虽政治变动频繁、战争此起彼伏，但学人仍作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第二阶段基本属于荒废和接续时代，19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史自觉意识的确立才真正接续了原有的现代学术传统；就第三个阶段来说，中国现代学术才刚刚开始不久，仍在进程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是否能拿出“过硬”的成绩来，对于“中国崛起”至关重要。因为，一方面是条件基本具备。当此时代，学术史意识已成常识；全球化趋势已大势所趋；电子信息化的应用也都相当普及。中国现代学人可以基本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对西方学者，挑战和机遇并存。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做？另一方面，国

家之发展需要学术的进步、思想的创生。撒切尔夫人不无傲慢地宣称,中国崛起不足为虑,因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只输出物质产品而没有精神产品;在她眼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文化产品可言。未来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期。而最关键的,则是中国的大脑,作为学人的学术与思想,因为他们将成为中国前进的灯塔。故此,学人之承担国运之责任也不可谓不重。当然,这里重点关注的仍是民国,将其定义为狭窄的概念之内,即传统上的1912—1949年间。虽然就长时段眼光观之,这短短的37年间实在不过“白驹过隙”,可其中孕育的学术生机可能,却确实是“浩浩然大哉”。

就代际变迁来看,可分六代人。原生代(即介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过渡一代人),以沈曾植、罗振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在1870年前后出生,在传统学术方面造诣深厚,部分学人又借助留东(日本)之便,而得以窥见西学门径,乃是传统学术的终结者与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一代人;第一代,1890年前后生人,以陈寅恪、胡适、汤用彤、吴宓、郭沫若、冯友兰、朱光潜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具有良好的国学修养,并得时代之机遇而能留学西方(主要是欧美,但如陈垣、钱穆等未留学),不以求学位为终极目标,在五四前后留学归来,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颇多人集中在北大、清华这两大重镇;第二代,1910年前后生人,以钱锺书、费孝通、冯至、季羨林等为代表,他们仍具有一定的旧学基础,但除极少数外已难与前代人比肩,多半在抗战前后留学归来,获有博士学问,倾向专门之学,以外国做研究对象者不少,他们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1980年代后的学术薪火传承有重要意义;第三代,1930年前后生

人,以李泽厚、庞朴、叶秀山、谢冕、刘再复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在一种救亡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中成长,多半没有留学机会,学术训练与知识积淀都有先天不足,但具备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自学成材的能力,部分学者能利用特殊的时代境遇仍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第四代人,1950年前后生人,以葛兆光、陈来、陈平原、桑兵、汪晖等为代表,他们多半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或研究生,有机会到国外进行学术研究,接触到西方的学界状况,部分人也攻读了学位,并借助改革开放和中国发展的东风,形成了自觉的学术史意识,重新接续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较之前代学人明显有突破,积累了相当的学术成绩,是目前学界的领军人物;第五代人,1970年前后生人,这代人基本尚在形成之中,他们是第四代学人的弟子辈,同时又与第三代学人产生某种“亲密接触”。当然,这样一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它的特征概括也只是相对而言,其目的是为理解民国学术提供一种参照系和整体学术地图坐标。

民国一代学术,主要是第一、二代学人的学术空间。当五四一代以一种“元气淋漓”的激烈方式而确立起自己在学术、文化场域的主导性占位后,后五四一代当然深受影响,纷纷漂洋过海,学习师辈的成功经验,立志“为中国文化寻路”;在1930年代后期,他们的弟子辈多半放洋归来,成为抗战建国年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力军。尤其是西南联大的熏陶下,可谓成就了“两代学人”的精彩共舞时代,中国现代学术不但开创了极为辉煌的“事功年代”,且不说自然科学家如华罗庚、陈省身、周培源、吴大猷、曾昭伦等人的成就,就列举一下人文学者的著作吧!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金岳霖的《知识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锺书的《谈艺录》、潘光旦的《优生

与抗战》……正所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纪念碑文）。

当前辈学人的学术史勋绩以如此绚丽、厚重甚至不乏悲壮的方式集中呈现时，他们坚守“书斋”的努力和“纸上苍生”的努力，就不仅是一种资源，一种能被后世学人再生利用的宝贵学术资源，而且也自然形成一种坐标，一种后代学人可以由此出发、寻得自己精神安身立命处的“大学术”！这样一种坐标，或许还不能给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苦苦支撑的纯正学人以实在的“物质支援”，但朱自清先生拒绝美国救济的选择，却仍有那样一种无言的力量。这样一种坐标，其实传递给我们的，更是一种传统，一种中国学术积淀千载、现代重生，完成转型之后又规定未来民族血脉的纯正学统。这，才是最值得发覆的一层含义。

相比较原生代人的元气淋漓、第三代人的先天不足、第五代人的行进之中，那么，目前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学术创造实绩的，是第一、二、四代人的学术成绩。尤其是作为承上启下、接续学统的第四代人，他们可谓是“后来居上”，已经贡献出了相当不凡的学术成绩，而且在著述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不凡的表现。诸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2卷、汪晖《现代中国思想之兴起》4卷、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桑兵《国学与汉学》等皆堪代表，相信不但可以“藏之名山”，亦确可“传之后世”。但恐怕不得不承认的也是，在第四代学人中确实尚未出现如陈寅恪、钱锺书那样横贯而通的大家人物。

民国一代学术，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纯正源头，其功用也不可谓不大。希望我们这些来此探胜者，不要采玉宝山，空手而还。重温第一、二代学者的学术史贡献，不但可以使我们借鉴学



习前人呕心沥血的资源宝藏,而且更可以重温激情岁月的开创时代的学人精神。通过民国学术的重要成就的梳理和重版,我们希望能再现那代学人的“岁月峥嵘”。无论是在文史哲等人文领域的“确立典范”,还是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凡起例”,我们看看著作的题名和作者的立意,就知道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前贤曾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曾确立了一个如何辉煌的起点?本丛书虽然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但却并非不具备学科史的基本眼光,邀请的导读专家就是从这样一个层面考虑。而在一般意义的学科划分系列之外,又特别增辟了“海外博士论文”系列与“学术研究译著”系列。前者希望借助民国学人在留学时代的精彩创发,让我们一窥兼采中西之后的学术规训之作究竟可以达到怎样的一种层次,虽然其撰写语言并非中文,可这毕竟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借助学术父辈们资鉴他山之玉的具体成果,希望不仅能将他们呕心沥血而移玉东来的学术译著化为今日后辈负重前行的重要资源,更期待藉由此一窗口展现那代学人胸怀天下的“世界学术”之整体认知。敬请读者关注。

陈寅恪先生曾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这是以世界学术的眼光来衡量正在创立期的中国现代学术,其批评不可谓不严厉,其言辞则不可谓不中肯。吾辈或可加一句,“有之,自寅恪先生始”。作为中国现代学者第一人,寅恪先生强调“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他不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立起关乎中国现代学术根本的价值观,为后世学人之立精神;更以治学态度的“通识观”确立起学人微观层

面可以依循的伦理观。而中国现代学术的未来发展若能建立在这样一种“通识意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基础之上,则中国现代学术之于世界学术的位置,或可有所希望哉!是为序。

叶隽

2009年4月16日—6月15日

作于北京—欧行旅次之柏林,改定于7月26日北京

## 著者序

英美的政治学说何以不呈五颜六色的状态，这可以将两国的国民性作解释；但何以政治学说史也不十分能吸引两国人的精力，却不是这样容易了解的事。大西洋两岸说英语的民族曾自夸保有了并实行了正当的政治观念，但以他们的历史家的努力——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毕竟没有人专心致志去追究这些观念在历史演进中的起源与发展。固然，说英语的学者已打破了流行甚久的偏见，不再以为宗教改革以前及同族人以外的政治生活与思想不值得耗费历史家的精力。上中古的生活与制度已比较的被人注意，英美著作界在这方面已发扬了极大的光辉。并且在这些最引人探讨的政治的及宗教的制度以外，一切种种思想如文艺的、神学的、玄学的、伦理的等等，也已有人努力对之作历史的探索。但直到现在，还未见有人对于政治思想也从上中古以次追究其演进之迹。

这本书的出版就是想填补这种缺陷。著者深惧这本书不能名符其实,但希望,能略示人以这一部分学问的头绪。如果能使人们对于政治思想由邃古至近代的变迁因此比较明了,或者另一个人能因本书的暗示而完成这种使命,这本书就不算白写了。

为指导读者作更深的研究起见,每章之末特附录参考书目;并于全书之末将本书曾经取材的书依字母的次序列为一表,又加入一些旁的书。这大半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研究生亚伯尔君(Mr. W. Maitland Abell)的功劳。

亚里士多德一章曾在《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发表,马凯维里一章曾在《国际月刊》(*International Monthly*)发表,内容形式与在这本书的没有什么差别。同事史密斯教授(Munroe Smith)及鲁滨生教授(James Harey Robinson)曾与著者以许多的指教,亚伯尔君曾孜孜为著者制作参考书目,并校对各种引证,著者深深铭感。

一九〇一,十二,二六,于哥伦比亚大学。

## 译者序

著书是用一种符号以表示著者心中所要说的话，译书是用另一种符号代替著者所用的符号以表示同样的意义，所以译品的成功或失败，要看译者所用的符号是否与著者所用的符号涵义完全相同。两种符号的涵义常不能恰好一致，有些人于是以为一个符号只能代表一个意义，一个意义只能有一个代表的符号，所以任何文字不能译成另一种文字，甚至一种文字中的一句言辞也不能译成同种文字中的另一句言辞。这种主张在理论上自然也有他的逻辑，但事实上我们万不能信从这种极端的见解。我们以为，以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符号而求完全不失原来的意义，固然每每是不可能的事情，如德文的 *recht* 或法文的 *droit* 在英文中就没有相当的字可以翻译，通常难译作 *right*，终嫌不能十分恰当，至于中文的译名“权利”或“法律”，更只能表示原意的一方面而已；但一个符号虽然有多方面的意义，人们用这符号时常只用其一方面的意义，在这时自然比较

易于翻译。所以这几个字有时就可译作权利,有时就可译作法律。因为人们用字常只用其一方面的意义,所以翻译是可能;因为一个符号常不能代表另一个符号的全部意义,所以翻译的可能性终究有一个限度。

译者翻译这本书时曾力求不失原著的意义,但因为英文翻成中文的可能性究竟有一个限度,并且译者在这两种文字上的造诣非常浅薄,这译本自然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这只能求读者原谅,译者自己所能做到的,只是尽我个人的能力而已。

因为缺乏中文参考书籍,有些名词常要自己创造。例如第一章的 *political capacity* 二字,著者本意是指治人及治于人的能力,译者却译为政治能性。能性二字是译者杜撰的。*capacity* 通常本译作能力,但此处若用能力二字似乎只能表示自动的方面而不能表示被动的方面,所以译者改用能性二字。这两字虽然比较生硬,但译者以为比能力二字涵义较宽,所以用在此地比较相宜。凡用这种极似不通的名词时,译者每加小注,或附录原文。当然,疏漏也是在所不免的。

有许多名词在中文中已有通用的译名,但只译出一方面的意义,而在原著中这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又远较中文译名的意义为宽,这时译者每应用音译法,而附原文于下。如 *aristocracy* 在中文中通常译作贵族政治,但在本书的第三章译者却译作“亚里士多克拉西”,因为这章中的

aristocrac 有许多的意义。这章中的“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与“波里迭”(Polity)亦然。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在能够用通用的译名时,译者决不愿标奇立异。

有许多名词在中文中已有通用的译名,但译者没有知道,因此只能据己意翻译。如 Franciscan order 译者初译作佛兰西斯派,及至看见何炳松先生的《世界史》的序文,才知这名词在中国教会中已有通用的译名,叫做圣芳济派,才加以改正。译者深惧不及改正的地方太多!

最难译的是从古人著作中引来的话(Quotations),有时竟非察看原书不能了解其所指的意义。关于这一点,译者虽然利用了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大学的图书馆所藏的书,但因为这两校的图书馆太贫乏,所以译者没有得到充分的参考书,而译文也更不能得心应手。至于这本书从《圣经》中所引来的话,则翻译时完全参照美国圣经传播处所刊行的华文《白话圣经》而略加修改。

原书中有许多小注,这些小注凡译者所认为万不可省略的,每将其译出而用括弧插于正文之中,有时甚至与正文混合,以补助正文的明了程度。

著者但宁先生,学问精深,文笔雄浑,译者翻译他这本书时感觉到许多困难。他对于一切掌故非常熟悉,下笔时运用自如,随手摭拾,都成妙趣。但他愈是运笔如风,译者愈是望尘莫及。他的警句就是译者的难关。译者虽尽力想不失原著的意义与风格,自知成就实少。

但是，译者也要向读者声明一件事。中国人现在似乎有一种流行的谬误观念，以为任何书籍，只要是中文的，便可一气读完，并且完全理解。因此，每有一本在国内外国大学高年级所用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因为有中文本，便有人虽然对于那门学问毫无根基也想在一两天内将他读完，而遇到难解的地方，便咒骂著者或译者以泄愤。社会科学在中国是最被认为容易了解的科学，所以社会科学书籍的著者或译者受过这种咒骂的也最为繁夥。但这实是不应该受的。译者固然不敢怀疑这本书的读者具有这种谬误观念，尤其不敢自信译文中没有难解或错误的地方，但在此似乎不得不有这种声明。声明的动机一方面固然是要为自己解嘲，一方面则希望借此提醒读者，俾读者遇着难解的地方时多参考其他书籍。

在这本书以前，中文的政治思想史书籍已有高一涵先生编的《政治思想小史》及《欧洲政治思想史》卷上卷中二卷。这三本书译者都曾读过，翻译这本书时自然得了高先生不少的益。高先生的书有一部分是从外国书本翻出，有时所根据的原本就是但宁先生这部《政治学说史》，但译者的译文与高先生的译文每每出入很多，这是因为译者翻译时没有将两先生的著作时时对照。当然，凡没有根据高先生的著作而加以修正的错误，译者是要完全负责的。

一九三〇年，一月，廿五日，南京。



## 导 言

在任何人类社会之中,总找得出一种规束权力(Regulating Authority)。这权力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作用与形式,英帝国与古代希腊的城邦不同,法兰西民族国也与巴布亚(Papua)土人的部落有异,然而无论形式如何,多少总可以决定那社会各分子间的相互关系。在社会情况尚滞留在野蛮状态的时候或地方,这种权力的行使及服从,不由于强力,即由于不知不觉的习惯;文化一经发达,人们对于这些现象,乃从事于探求一种合理的根据。最初的答案,正像自然科学最初的成绩一样,在理智较发达的人看来,荒谬得可笑;但无论怎样,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地方,只要人们对于这权力的起源、性质及范围等有鲜明的观念,这就是政治学说史的资料。

不过,本书并没想包括偌大一个范围,原始社会的政治学说不在此内。何以如此,篇幅有限是一个正当原因,此外就科学方面而言,再有几种理由。原始社会的政治思想范围广漠,我们对他的知识非常幼稚。虽然近代学者研究的结果,已能使人对于